

近期欧洲社会政治思潮演进的主要动向、成因与影响分析

代金平¹, 吕瑞金²

(1. 重庆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市 400065;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北京市 100860)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促使欧洲社会政治思潮出现一种偏离理性的激进和保守化趋势, 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 激进或极端思想大行其道, 社会健康力量怯于伸张正义。出现这一现象是欧洲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与结构性问题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 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这种思潮的涌现, 反映了欧洲社会的某些消极面, 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大国雄心”的推进, 影响其国际形象, 但欧洲最终会走出这一阵痛期而趋向正常轨道。

关键词:欧洲社会思潮; 演进; 动向; 成因; 影响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6)02-0038-06

较长时期以来, 欧洲一直是当今世界社会政治思潮比较活跃的地区。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舆情民情发生重要变化, 尤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 其政治思潮呈现明显激进与保守化同时凸显的势头, 相对健康的主流价值理念受到冲击, 社会包容心态有所弱化, 民众心理趋于内顾和保守, 极端思潮迅速扩张。尽管这一思潮在 2015 年的难民危机中有所矫正, 但目前又受到冲击。这种趋向对欧洲当权者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态演变带来重要影响,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欧洲多国的对外政策运作, 其负面效应已经在某种层面显现出来, 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近期欧洲社会政治思潮演进的主要特点

近期以来, 欧洲国家社会政治思潮演进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理性成分有所淡化, 非理性因素趋于凸显。受部分激进与极端势力挑动, 社会的躁动情绪上升,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欧洲意识形态的左右摇摆, 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一) 欧洲怀疑主义思潮走盛, 对欧洲一体化的质疑声浪高涨

在战后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 欧洲一体化是凝聚欧洲单个民族国家实现融合的最好平台, 其在精神层面的一个历史性成果就是促成了一种“欧洲观念”的树立^[1]。冷战后, 从表面上看, 这种“欧洲认同”似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空前的深化与发展, 欧盟成员从 12 国到 15 国再扩大到今天的 28 国。欧盟不仅创立了超越单一国家的货币即欧元, 而且建构了名义上的“欧盟政府”。然而也要看到, 在欧洲一体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中, 由于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中的差距日趋凸显, 特别是冷战后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考量”因素的加重, 导致欧洲联合“通过共同体功能性的发

收稿日期: 2015-11-08

作者简介: 代金平,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重大委托研究课题“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研究”(2015SKJD09), 项目负责人: 代金平。

展来实现一体化”的轨迹有所改变^[2]，作为一种“政治工程”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日益增多，疑欧主义也因此“水涨船高”。尤其是在欧洲经济社会形势欠佳的环境下，这一思潮就更加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欧盟多数国家，不仅极左、极右翼势力反欧、反一体化声浪高涨，而且部分国家某些传统政党政要、社会精英及普通民众疑欧情绪也在上升，把欧盟、欧洲一体化当作危机的“替罪羊”，极端政治势力更是大肆蛊惑。比如，意大利五星运动领袖格里罗提出就废除《马约》进行全民公投；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勒庞主张抛弃欧元；丹麦人民党对欧盟呼吁“把丹麦还给我们”；德国抉择党提出“有序解散欧元区，重新引入马克”的主张，竟赢得四分之一德国人的共鸣。英国保守党内疑欧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卡梅伦在压力下于2013年发表“脱欧宣言”，声称如该党在2015年大选获胜后继续执政，将于2017年就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该党在2015年的英国大选中获得大胜，目前已在为这一公投作准备，包括同欧盟进行谈判。更有部分国家的某些社会精英从深层体制构建上对欧洲一体化泼冷水，认为欧盟多元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为此提出了“重新民族国家化”主张。据欧洲相关民调统计，当前德、法、意、西等国分别有44%、43%、45%、72%的民众有疑欧主义倾向，甚至觉得“没有欧元会更好”，欧洲民众对欧盟支持率从欧债危机前的60%多跌至近期的45%上下。

（二）质疑和反对全球化思潮明显抬头，锁国心态上升

应当说，作为发达国家重要群体的欧盟国家，在较长时期里都是当今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欧盟多数国家遭受重大危机冲击，而部分新兴国家在此过程中迅速崛起，这使得欧盟内部一些群体作为全球化“受害者”的心态开始凸显出来，导致在欧洲境内有关“规范全球化”、“修正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泛起，认为西方主导全球化的优势逐渐丧失，为此敦促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要遵守“游戏规则”，以提高其参与全球竞争成本，并由此加强对全球化的管控。欧洲一些舆论认为，全球化本身无可厚非，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倾销导致发达国家企业外迁、蓝领工人大量失业，工资水平普遍降低，社会不公现象愈加严重，认为全球化是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玛丽·勒庞宣称，全球化正在毁掉法国，将导致欧洲人口泛滥和文明弱化。近期以来，欧元区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去全球化趋势的中心，欧盟近期爆发了上百起规模不等的反全球化运动。英国部分钢铁厂倒闭，就引发一些工会起来闹事，指责中国钢铁行业的倾销政策是“祸手”。许多人不敢相信，反全球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主要是西方世界^[3]，特别是欧洲国家。

（三）排外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上扬，社会宽容心态明显弱化

应当说，在战后以来的较长时期里，对于接纳国外移民特别是难民，西欧国家还是比较宽容大度的，尽管多国政府始终面临国内激进势力的压力。然而，自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气候发生明显变化，欧盟多国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扩张，排外言行趋于激烈。荷兰贝克曼基金会负责人贝克尔承认“反伊斯兰思潮正在（欧洲）蔓延”。在2014年底发生对法国巴黎《查理周刊》编辑部的恐怖谋杀事件后，欧盟多国爆发了反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游行示威，其中也夹杂着排外主义、反对穆斯林的非理性抗议活动。随着2015年巴黎发生类似美国“9.11”式的恐怖事件，以及德国科隆在2016年初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更是为欧洲的排外思潮培育了土壤。近期以来，欧盟多国民粹主义势力均声称，移民和不断增强的多元化趋势，正不断威胁本民族文化、国家认同和传统生活方式。希腊金色黎明党为此主张“赶走所有在希腊的外国人”。奥地利自由党高喊“奥地利人优先”的口号。玛丽·勒庞宣称“法国是法国人民的”^[4]。不少欧洲民族主义势力声称，反对外来文化和多元文化融合，要“保卫欧洲文明”。更值得担忧的是，甚至连默克尔、萨科齐、卡梅伦这些大国领袖也公开撰文承认，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彻底失败”，它忽视了“国家认同”，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滋生。欧盟的最高决策者都发表如此悲观的感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欧洲社会确实因为移民问题出现内部撕裂，其影响将极其深远。

（四）贸易保护主义思潮进一步抬头，经济民族主义回潮

贸易保护主义并不只是在欧洲国家出现，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在西方曾多次发生。但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经济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在欧盟国家强势回潮,具有更大的社会市场。这种思潮点燃了欧盟多国的“内顾倾向”,欧洲总体出现“只向内看”的趋势,“拯救你自己”的观点大有市场,乃至欧盟一些政治家都强调:“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然后是照顾邻里”。欧洲多国民粹主义势力将本国经济困难归咎于自由贸易,宣扬要大力保护本国产业和企业,保护本地就业,加大贸易的技术壁垒,严格限制外国特别是新兴国家产品进入。玛丽·勒庞强调,欧洲应实行“聪明的保护主义”,推行“国民优先”政策。上届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提出,要取消对中国、印度等富裕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优惠,并在2014年起将普惠制受惠国数量再减少一半。特别是在2013—2014年间,欧盟部分国家因为中国光伏产品输欧问题,几乎要打起贸易战。

(五)政治虚无主义倾向日显,反体制、反现政权的势头日盛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各国经济社会困难,欧洲许多国家的极左和极右等极端政治势力都将矛头指向传统政党和现行政治体制。多国民粹主义势力亮出“反精英、反权威、反传统”旗帜,反对一切现存体制,宣扬所谓的平民主义和直接民主,主张依靠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政治运动来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将本国“个人主义”推向顶峰。意大利五星运动竟提出“反政党,还政于民”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其领袖格里罗更是叫嚣:“让所有政治家都滚回家”。甚至像欧洲一些并非激进和极端的政党组织,也以鲜明的“反体制立场”作为其共同的价值取向^[5],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当前,欧洲一些国家民众把对政治不满发泄于执政党和政府身上,认为本国政府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不足,执政党应负主要责任。77%的英国民众认为政府应对危机“表现软弱”,只有16%的希腊公众相信执政党有能力带领国家走出危机。而据欧盟相关民调统计显示,目前欧洲75%的民众不相信政党,60%不信任政府,50~60%不信任议会。公众对政治的信任度下跌到历史新低。2015年年初,西班牙马德里的抗议群众就打出“人民党、工人社会党的末日来临了”的横幅^[6]。在希腊,大多数民众反体制、反现政权的情绪更集中地体现在近年的大选上。几十年来作为希腊主流政党而且在历史上得票率甚至超过50%的泛希社运,在近几次选举中的得票率轮番下降,沦落为边缘小党。而长期作为体制外的激进反对势力希腊左翼联盟不仅在同期的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和主要反对党,而且在2015年年初提前举行的大选中竟成为第一大党而上台执政,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欧洲舆论甚至为此预测,希腊左联党的上台执政,是否意味着欧洲地区开启“欧洲之春”。

二、近期欧洲社会政治思潮演化的深刻原因

欧洲社会思潮的演化,直接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但其深层原因背景则是欧洲传统发展模式的受挫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综合实力的下降。

(一)危机冲击下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尖锐是主要原因

近20多年来,在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中,欧盟国家经济形势相对欠佳。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低迷。而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更是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欧盟多国经济持续数年负增长,希腊个别年份跌幅乃至超过10%。财政状况普遍恶化,紧缩政策导致多数民众收入减少,中产阶级队伍萎缩。仅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国家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近千万人,即便仍属于中产阶级的相当部分人,生活水准也在相对下降。而不少中下层民众更是困苦不堪,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困扰着数千万的贫困群体。当前欧盟失业大军仍高达2700万,部分南欧国家青年失业率在50%以上。这种严峻形势,导致欧洲多国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各种社会抗议风潮此起彼伏,十几国执政党因危机冲击大选落败而下台。在欧洲,正是由于形势动荡导致多国政治乱象迭出,民心思变心态凸显,进而引发欧洲社会政治思潮出现“大鸣大放”,异端思想任意发散,非理性情绪急剧上扬,欧洲社会陷入少见的思想迷茫期,这一状况在大选时期更加突出。

(二)欧洲民众心理失落、长期的优越感不断失却是重要诱因

战后以来,西欧国家通过几十年的黄金发展期,积淀起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形成了一套运转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了甚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民众生活水平与质量显著改善,欧洲公众

的优越感处处可见。但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内外环境与时代变迁,这种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社会福利不断削减,就业压力陡增,社会竞争加剧,部分中产阶级出现身份倒退,“好日子到头了”的悲凉心理弥漫社会。当今法国不少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境遇不如父辈,对未来的信心明显不如上一代。欧洲多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代替了长期的优越感,心理落差增大,忧愤心态上升,失落和义愤情绪冲击欧洲,直至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抗议活动来发泄内心不满,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前欧洲社会政治思潮演变。

(三) 国际政治力量演变朝新兴国家倾斜, 引发欧洲社会的失衡和焦虑心态迸发

新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加速发展,欧洲不少国家的不适应症日益显露,特别是表现在:其创新动力衰减,制度活力下降,体制红利日渐耗尽,在全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渐显,甚至频频陷于被动挨打境地,欧洲在多方面所曾拥有的优势不断地弱化乃至丧失。对于这种变化,欧洲社会大多数阶层群体感到茫然、困惑,在认识上一时难以转过弯来,也未能及时地反思和调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处在大变动、大调整过程中,世界政治力量重心在向东转移,尤其是出现加快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化的趋势,欧盟综合实力下滑势头明显,欧洲的地位和重要性在相对下降,“欧洲衰落论”触动了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敏感神经。整个欧洲社会的失意、焦躁和不安情绪较为精准地聚焦在社会政治思潮的跌宕起伏上,并通过其对移民的态度和政策、在对外政策特别是新兴国家政治与经贸关系上得以反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对自身地位变化所作出的失落反应尽管是无奈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对新的世界的适应无疑会经历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转型过程。当然,不同国家在此过程中的步调是不一致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

(四) 欧洲多国执政党、政府以及政治家存在主观上的责任

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和升级后,欧盟不少国家政府、执政党无疑存在政策欠妥及政治家的作为不当等问题。他们在危机面前反应迟缓、应对不力,个别国家甚至方向有误,引发民众不满。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政府在欧债危机爆发后的观望、迟疑态度及后来的严厉紧缩政策,招致许多当事国民众的义愤,导致疑欧主义思潮抬升。而那些重债国民众则对执政党和政府屈服于德国和“三驾马车”指令、委曲求全、表现软弱而感到愤慨,导致各种非理性言行喷涌,把执政党和政府置于被告地位,极端势力甚至归罪于传统体制之过。南欧国家许多民众都把本国主流政党视为其遭受苦难的“祸因”,非理性地将不满发泄于它们身上。尤其是 2015 年希腊由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下台,无疑是希腊大多数选民出于对当前工作生活状况的不满,而给予主流政党的一种惩罚。为此,不仅欧洲极左翼兴高采烈,而且欧洲极右翼势力也为之弹冠相庆。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勒庞表示,尽管该党与希腊左翼联盟并非志同道合,但“我们还是欢庆他们所取得的胜利”^[6]。应当看到,在深刻的危机前,正是由于欧盟国家一些执政党高高在上,脱离民众,未能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新变化,出台的政策议题与主流民意相悖;部分国家的政治家明哲保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骑墙立场,如对本国反穆斯林言行态度含糊,迁就非理性的民众情绪,使得整个社会缺乏明晰的评判尺度,主流价值观动摇,导致非主流思潮甚至异端思想大行其道。在思想道义准行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引领,在道德的匡正上缺乏应有的担当精神,这是欧洲国家当权者尤其是执政党未能切实履行责任的重要主观原因。

(五) 与极端政治势力的煽动蛊惑和部分媒体的过度渲染有一定关联

当前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缘何趋向激进化、保守化?这无疑是欧洲多年积累的严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物。但也要看到,欧洲极端势力利用和部分媒体的助燃,放大了这一趋势的社会影响。欧洲多国极端势力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介,利用多数民众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大肆鼓吹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疑欧主义、反全球化、反传统体制等极端思想,煽动民众不满,唯恐“天下不乱”,以达其不良居心。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部分媒体甚至是主流媒体为了吸引观众眼球、扩大自身影响,也不惜加入了与极端势力的联动和合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的反常与乱象。从深层次上看,这无疑与欧洲部分政治与社会精英长期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没有原

则的民主有相当的关联。他们长期鼓吹功利主义、利己主义,诱导民众毫无限制和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把欧洲社会描绘成一种享受社会,进而使得欧洲现代社会面临一系列“发展危机”^[7],有的甚至成为多国的结构性顽症,成了本国极端势力和部分媒体能够长期利用的“武器”。

三、近期欧洲社会政治思潮演变所造成的多重影响

当前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的激进化、保守化趋势,对本地区大多数国家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的政治版图重塑,严重损害其软实力与外部形象,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干扰了欧洲一体化顺利推进,迟滞着欧盟“大国雄心”的实施。这种消极影响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作用到本国政府甚至欧盟整体的对外战略策略上,对其双边和多边关系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不少有识之士为之忧虑。

(一)部分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生态,导致一些国家政党格局重塑

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主流政党作用与影响下降,尤其是亲欧和对外来移民较为宽容的社会党受挫更加凸显。泛希社运五年前还是第一大党,而在2015年年初的议会选举中竟沦为得票率只有4.67%的小党,排在进入议会的七个政党末尾,甚至未及希腊共产党。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希腊实行共和体制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德国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差距拉大,在最新一届选举中两者至少相差15个百分点。荷兰工党、芬兰社民党等持续衰落。二是多国政党格局出现大变化。意大利当前出现民主党、自由人民党和五星运动三足鼎立新格局。希腊左联党取代新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德国自民党可能在小党竞争中退出政治舞台,德国“另择党”可能取而代之。西班牙政党格局因2015年的大选发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的两大主流政党轮替,向当今的“四强鼎立”趋势演变,第三、第四大政党“我们能”党和公民党均是新兴政党。英国也自2015年大选后,已从原来不稳定的多党制迈向相对稳定的多党制,进入议会的政党由原来的三个,现在已增加到五个以上。苏格兰民族党崛起,自民党衰落。多国极右翼政党在本国政党格局中占据更大的空间:希腊金色黎明最近获议会选举7.1%选票,成了政坛第三大党。瑞典、瑞士、奥、英、德等多国极右翼政党近期选举得票均明显上升,如瑞典民主党在最新一届大选中上升为第三大党,成为影响当今瑞典政坛稳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上述情况都是欧洲国家以前所难以想象的,这表明欧洲国家政党政治进入了战后以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其动向值得关注。

(二)欧洲多国民意支持基础削弱,制约当政者的决策和施政空间

民意成了当前欧洲国家执政党施政的重要考量因素,如何争取民意来推动政府的政策施行对于执政党攸关重要。因受欧洲不利政治气候影响,特别是多国民意内向、自顾和务实心态制约,欧洲许多国家当政者未来决策更加艰难,不得不更多顾及本国民众情绪,以更现实、短视的态度处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包括放缓改革步伐,推迟乃至中止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收紧移民政策,尤其是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加严厉政策。在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部分国家还一度出现对中东等国难民“宽容”的迹象,但随着法国巴黎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德国科隆出现难民性侵事件,如今这一势头出现逆转。当今欧洲不少国家,对本国伊斯兰移民的“穆斯林化”严加限制,如法国通过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戴头巾;政府决策和政策推行更多地向极端政党主张让步,甚至在体制外寻求后者的认同和支持。像希腊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为了尽快摆脱欧债危机深度负面影响,曾经不得不严格执行“三驾马车”制定的治理方案,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尽管从长远讲有利于希腊国家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但这是以较大程度地牺牲大多数民众的现实利益为代价的,引发后者的严重不满,可以说与希腊当前的民意不符,因此两党遭到了选民的抛弃,而把提出要废除紧缩政策的左翼联盟推上了台。欧洲媒界担忧,希腊的这种“模式”,事实上已经部分地传染给了2015年底进行大选的西班牙等欧盟重债国,传统政党持续受挫。

(三)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及多国对外政策,尤其是欧盟与一些重要伙伴方的经贸关系受到影响

从国际层面,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的激进化、保守化将对欧盟及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多方面影响:一是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将更有选择性地、有限地介入、收缩战线,更多地量力而行,对地区冲突的武力干预持更慎重态度,如对“伊斯兰国”崛起后的叙利亚问题、乌克兰政府军与东部武装的冲突问题,欧盟和一些大国更多地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支持力度下降,尤其是国际援助将较前收紧。二是在经贸关系上立场趋于强硬,部分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势头凸显。欧盟一方面将收紧外国商品进口,设立各种非关税壁垒抬高门槛,并且对外来投资包括中国对欧投资加大审查环节和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对本国相关产品、产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欧盟及一些成员国较前更多地拿起贸易制裁的工具惩罚竞争对手,对华贸易摩擦近几年来明显增加,不仅对中国传统的输欧商品如纺织品、钢铁产品举起贸易制裁大棒,而且对通讯电子、新能源等产品也发起调查,特别是不久前在光伏产品上曾一度威胁要对我国进行严厉的关税制裁与惩罚,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态度依然消极。三是经贸关系政治化的色彩趋浓。近期以来,欧盟委员会直接干预贸易争端的情况明显增多,经贸摩擦中的政治色彩成分加大。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欧洲舆论更多地从政治、国家安全角度进行炒作,阻挠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如封杀中国商人黄怒波在冰岛买地投资计划,对中国复星集团收购法国地中海俱乐部进行“妖魔化”宣传。值得关注的是,面对目前欧盟一些国家钢铁行业的亏损乃至破产趋势,欧盟国家内部对于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而寻求扩大外销的指责增多,欧盟委员会在2016年初公开声称,将对来自中国的部分钢铁产品发起新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为了捍卫欧盟的经济利益,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批评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所谓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民主建设”的“错误倾向”。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欧洲社会思潮变化对于欧盟传统的自由、开放贸易理念与立场的冲击和影响。

(四)当今欧洲社会政治思潮激进化、保守化势头,会伤及当下各国的政治经济运作,但尚不致危及欧洲根本与长远发展

毫无疑问,这是欧洲各国转型与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导致欧洲社会引发一场价值观危机,对各国当政者是一剂“苦药”,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和阻碍各国重大改革战略、发展模式的调整及欧洲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目标的顺利推进,制约欧盟的“大国雄心”。对此,欧洲多国主要政党、有识之士和各进步力量当前已有所警惕,正在各自探索谋求可行的应对之策。总体看来,欧洲社会的健康、理性力量依然较强,随着未来欧洲经济逐渐回暖,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阵痛期熬过,加之战后以来欧洲进步主义思想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积淀,在可预见的将来,其社会政治思潮终将以正压邪,最终走向常态。事实上,随着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过去,南欧重债国的形势总体趋于好转,欧洲一些国家经济步入缓慢回升势头,使得欧洲社会的自信心已有所回升,社会政治思潮领域的理性声音在逐渐回调,欧洲的未来也将在不断的反思、调整中实现重塑,渐渐回到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

- [1] 邢骥. 欧洲一体化风雨兼程五十载[J]. 国际问题研究,2007(6):10-15.
- [2] 田德文. 欧洲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47.
- [3] 夏林.“反全球化”的悖论——一个矛盾分析的视角[J]. 特区经济,2011(10):18-21.
- [4] 董玉洁. 法国极右翼“变脸”:换汤不换药? [J]. 世界知识,2011(4):34-35.
- [5]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研究报告(2013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97.
- [6] 王方,任彦,纪双城,等. 希腊左转开启“欧洲之春” 马德里10万人讨伐权贵[N]. 环球时报,2015-02-02.
- [7] 王金水,孙奔. 理性应对西方资产阶级公正观渗透的挑战[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6):183-187.

责任编辑 刘荣军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